当代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授课教师**沈逸 教授

**助教**助教（邮箱）

**目录**

[第一讲 绪论：后-后冷战时代与新时期国际关系热点解析 3](#_Toc159927398)

[一、“大争之世” 3](#_Toc159927399)

[（一）系统理解当代世界 3](#_Toc159927400)

[（二）正确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 4](#_Toc159927401)

[二、从后冷战时代到后后冷战时代 4](#_Toc159927402)

[（一）后冷战时代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特征 4](#_Toc159927403)

[（二）美国对后后冷战时代到来的反应 4](#_Toc159927404)

[三、全球热点局势梳理：美国的战略挑战 5](#_Toc159927405)

[（一）俄乌战争：从“最具价值”的投资到“战略性烂尾工程” 5](#_Toc159927406)

[（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威胁拜登连任的战略危机 5](#_Toc159927407)

[（三）中国方向：阶段性和缓与中国关系成为美国战略首选 6](#_Toc159927408)

[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热点的2024展望 6](#_Toc159927409)

[（一）持续深化发展的“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 6](#_Toc159927410)

[（二）美国的政治衰朽问题持续凸显 6](#_Toc159927411)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6](#_Toc159927412)

[六、理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 7](#_Toc159927413)

[（一）总论 7](#_Toc159927414)

[（二）认识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 7](#_Toc159927415)

第一讲 绪论：后-后冷战时代与新时期国际关系热点解析

2024.2.27

一、“大争之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将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止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制造了台湾问题。这就是以实力为准绳的国际关系。当代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是加速这种变化，还是减慢这种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GDP不断增加，但GDP的全球占比不断下降，可见其绝对实力虽然在持续增长，但相对实力已大不如前。那么，哪个行为体挤占了美国本来的GDP比重，这个行为体就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显然，这个行为体就是中国。从经济上来讲，中国和美国确实形成了一种“两极格局”。

在两个主体之间出现挑战时，存在一种政治手段即“解构”，其作用之一就是将挑战重新定义为非挑战。

二战之后，美国极力推行“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提倡的国际关系非道德化，即国际关系中并没有私人之间伦理道德的关系。

（一）系统理解当代世界

1. 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世界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阻拦自由贸易；当代，中国宣称要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对手是联合国军；当代，中国认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意味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正在加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急速变化，从“中国寻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转变为了“中国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从“遵守国际规则”转变为了“缔造新的国际规则”。

中国并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意味着中国仍然尊重“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但更注重确保这些原则正确地落实。这些规则不仅是规则，更是要将规则变为具体的为了世界福利的解决方案。此外，要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自身成为霸权主义国家。

2. 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与变化

当代的国际体系有以下特征：

* 中美两国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以实力分布衡量的国际体系经历深刻调整；
* 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聚焦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前任领导者基于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向麻烦制造者转移成为主要挑战；
*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此从存量竞争转变为对生产力的解放；
* 社交媒体高速发展日趋凸显全球资本主义内生结构性矛盾，“民粹主义”标签下的“右倾”趋势显著，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均面临“阶级-阶层政治”回归的挑战。《推特治国》一书指出，在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不只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更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差距，如当代美国的数字金融寡头。在这一背景下，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党选择了“拥抱财阀”，并利用着政治煽动的手段获取各个阶层的选票；
* 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与人口、族裔分界线重合的财富分界线引发群体性恐慌和焦虑。霸权国家一方面对外开支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另一方面承受着国内对国家财政用于对外而不用于对内的质疑。因此，相当一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选择了“内向化”，例如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
* 西方发达国家内贫富分化显著，阶层分野凸显程序性票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的内生矛盾，加剧国内政治极化的同时，增加了向新兴大国转嫁国内矛盾的冲动；
* 全球治理赤字显著。

自特朗普时期起，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较少提及“全球化”了；然而，考虑到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中国就要特别地提倡全球化，缔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再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迈向全球统一大市场，把边界对资本、信息、人等要素的限制降到最低。

（二）正确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

2018年，习近平提出认识和理解世界大势需要正确的“三观”，即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历史观方面，要把握关键细节，获取准确认识，不要被刻板印象局限；大局观方面，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角色观方面，要站稳立场，用符合立场的框架来看待和解释世界。

掌握当代国际关系有三个重要步骤：

* **了解基础事实：**善于查找利用原始档案，且能读懂档案中潜在的言外之意；
* **理解基本规律：**需要从历史中总结出理论性的解释，关注总体而非局部；
* **思考总体趋势：**思考并预测发展的方向，基于事实给出合理的预测。

二、从后冷战时代到后后冷战时代

（一）后冷战时代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特征

后冷战时代的开启的标志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一超”，“历史终结”成为可能；后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则是中国复兴、美国回应、“历史终结”的终结。

后冷战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西方主导下的超级全球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西方独大，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西方主导，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治理的西方主导。

后后冷战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西方的相对衰退与非西方的群体崛起。体现在西方国家普遍遭遇国内民粹主义的冲击与挑战，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中国贡献，全球经济议题与全球治理的“东西方逆转”（西方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逆潮流者，“泛安全化”名义下的心因性保护主义全面崛起；非西方世界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者）。

教授认为，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下被允许的体现形式。

（二）美国对后后冷战时代到来的反应

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霸权的心理-认知优势与实力边界呈现显著张力；美国无法摆脱挑战者，无法战胜挑战者，无法不依靠挑战者——合作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各项挑战成为首要选择。

2024年，美国国务卿沙利文在美国外交事务协会（CFR）上的演讲指出：

* 美国过去数十年用各种方式改变中国的努力已经失败；
* 美国需要一套新的对华战略，但现任政府还没有这样一套战略，只是有了新的做法：
  + 不像特朗普那么极端，以至于面临和中国全面冲突的风险；
  + 不像过去那么乐观，认为美国可以影响和改变中国；
  + 美国需要做三件事情：
    - 投资美国自己，提升美国实力（间接承认美国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 改善联盟关系（让盟友为美国拖延时间）；
    - 与中国竞争（稳住中国，精准制约，拖延时间，能拖多久是多久）。

三、全球热点局势梳理：美国的战略挑战

（一）俄乌战争：从“最具价值”的投资到“战略性烂尾工程”

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可支配的资源消耗快于预期；乌克兰战场局势俄罗斯占优，俄罗斯持续反攻；随着战争持久化、消耗化，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普遍倦怠；乌克兰内部出现危机。

2021年，拜登与普京在瑞士有过一次会面。据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希望拜登仿照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联中抗苏”的策略。然而，对这一历史关头，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2021年的俄美关系，其中的最关键的阻碍因素即是俄罗斯于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为此，若要缓和俄美关系，美国就需要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合法；但是，这样做相当于放弃了对“新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进而相当于放弃了在欧洲的霸权。这与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目的是不符的。

（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威胁拜登连任的战略危机

美国曾有“2.5场战争（二战欧洲战场、亚洲战场，朝鲜战争）”“1.5场战争”等说法，其中的“1”就是美国亲自参与的一场战区级战争。然而，当今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美国均未直接下场，无法投入决定性军事力量。这体现出当代美国与冷战时期美国截然不同的战略能力。

巴以冲突暴露出的问题包括：

* 美国以国内政治为导向的中东斡旋意外触发危机；
* 以色列国内政治危机耦合地缘政治风险，“协同共振”促成危机“失控”；
* 以色列军队战力羸弱，进展不顺，社交媒体大幅度削弱西方亲以色列媒体塑造的认知茧房，美国面临“犹太绞索”的意外威胁；
* 巴以危机外溢到红海危机，胡赛武装测试美国军力边界；
* 伊朗以及“中东反抗之弧”加剧行动，美国面临三难选择：
  + 在中东实质性增兵，大概率复制伊拉克、阿富汗经历，且干扰对中国战略竞争；
  + 放任以色列单独承受压力，在国内精英阶层面临亲以色列力量压制；
  + 无条件偏袒以色列，拜登政府面临失去2024年总统选举的直接风险。

（三）中国方向：阶段性和缓与中国关系成为美国战略首选

**美国感觉到了对中国的需要，在2024年总统选举的现阶段尤其如此：**美国必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必须依靠中国提供必要支撑，或者至少不要在俄罗斯、中东两个方向上公开直接与美国“打擂台”；美国政府需要在禁毒、人工智能、国家安全三个维度展示拜登政府执政成绩，必修得到中国政府合作（比如需要中国配合接听美国热线电话）。

**美国寻求稳定台海局势，管控可能的激进台独举动：**旧金山峰会中美事实上就管控激进台独达成了首脑级的默契；美国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直接规训岛内激进台独力量；国内政治成为主要的干扰因素来源。

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热点的2024展望

（一）持续深化发展的“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

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税收和借债。美国民主党目前既需要维护福利发放的数额，对富人征税的进程又在国会中寸步难行，因此其发展就必须由债务驱动。**高息-高股价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美国政治模式深度绑定**，选举政治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压制金融部门的发展，实现结构性产业调整。

**象征性的产业回流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竞争性选举政治。**制造业增长由高科技产业新开工基础设施增加值驱动，但台积电和三星的建设均遭遇结构性制约；美国的制造业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基建而非制造业本身，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大型的“以工代赈”；芯片与科技法案在运行中转型为“就业创造”与“社区振兴”的混合-公益型法案。

**美国基层民众的“缺乏获得感”加剧而非减弱**，民粹主义土壤进一步强化而非减弱。

（二）美国的政治衰朽问题持续凸显

**缺乏务实有效的治理能力。**可以看到问题，给出方案，调集资源，但不能解决问题；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本土产业链的重构，以及全球产业链调整，在实践中转化为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心理脱钩”实践。

**两党政治撕裂与极化**，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成为“两党三方”的竞选。

**具有社会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持续且普遍“政治化”**，如移民问题与得州边境危机。就2023年而言，中国向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剧增，显示了美国边境移民管控的问题。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关系现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1. 传统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逐渐浮现，约束条件下的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成为客观趋势。①中美实力变化的总体态势没有发生变化；②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与认知壁垒损害中美战略稳定，对冲和抵消中国维护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能力；③中美力量差距全面但非对称-非均衡的缩小，中美战略力量的稳定约束机制，从“最小限度核威慑+阶段性共同战略需求”，向“有限核威慑+非对称常规力量威慑+嵌套的经济-金融依存+议题性共同治理需求”转化，转化期导致中短期的动荡；④能够维持有效发展势头和发展动能的一方，将在长期的持续性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主动；⑤约束条件下战略竞争持续展开的同时，务实合作仍然存在空间与可能。目前所谓的“中美脱钩”，往往只是第三方中转贸易的体现，因此只是一种“心理脱钩”。
2. 系统性的战略博弈能力建设成为新时期中方的主要战略任务。实力对比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以反制促稳定”的新阶段；中美关系面临战略波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的战略错觉，校正这种错觉的主要方式是中方构建有效的反制能力。
3. 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存机制逐渐趋于深化。构建有效的“工具化”以及必要的“武器化”能力，将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压舱石。新时期中美战略压舱石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塑造的过程：与中国合作，美国有利可图；与中国对抗，美国会遭受不可承受的损失；美国并不具备可以随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不用遭受来自中国报复和反击的特殊地位；中美之间存在差距和差异，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对称的。
4. 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之一是政府治理能力。中国具备政府治理能力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产业布局和推动经济发展领域；克服错误认知，即中国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美国政府可以简单复制。
5. 美国实力的边界和能力的有限性正在逐渐凸显。经济和产业发展有内生规律，“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扭曲，将面临显著的制约和反弹。美国产业的转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客观历史进程，简单的补贴与税收减免，以及对外制裁，会造成供应链扰动，但无法促成产业回归，相反会加速美国失去对产业战略节点的有效控制。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6. 推动中美关系在新实力对比下进入新的稳健发展轨道会成为“实践性共识”。

六、理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

（一）总论

**政策、理论和历史三位一体。**政策、理论和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他们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 历史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基本事实、演进路径、客观参照；
* 理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揭示了本质、规律和机制；
* 政策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即如何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找到具体方法。

**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任何严肃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必须通过对历史的观察进行政策思考和理论升华。

历史、理论与政策应综合运用。以美朝关系为例：历史是1950年至今的美朝关系；理论包括同盟理论、局部战争、安全困境、博弈论等；政策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前景，以及美朝关系的发展趋势与影响。

历史、理论与政策之间有互动作用。作为锚点的历史防止了基于纯粹概念和想象条件的思辨游戏，直接或间接检验理论或者政策的可靠性；作为方法的理论促使对事实的认识是全面的，避免被部分材料所误导；政策则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输出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二）认识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

